

建强党组织 基层添活力

本报记者 刘晓宇

眼下又逢青蟹上市。在福建省福安市下白石镇洋村青蟹养殖基地，村民一大早就忙碌开了，捕捞、分拣、装筐……

“我们村地处咸淡水交汇处，养殖的水产品品质高、口感好，但过去‘有市无价’。”57岁的养蟹大户、村党支部书记陈平安说。

2022年，刚到洋村担任乡村振兴指导员的卓庚邀请专家进村“把脉”，最后商定全力打造“行洋四宝”品牌，授权种养殖户使用。

“有了品牌后，我们村的产品附加值至少增加10%。2023年，村民人均收入估计能突破3万元。”陈平安由衷赞叹。近年来，福安着力选派一批有乡土情怀、丰富工作经验的干部到乡村振兴一线打硬仗、攻难题，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同时，组织实施“党建赋能强企”行动，开展“千名干部进千企”活动，组建6支组团工业服务队，建设6个服务基地，开展“组团式”服务。

得益于党建工作联系点制度，坂中畲族乡南岸村也实现了蜕变。前不久，南岸村举行的“稻·渔丰收”旅游节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我74岁了，第一次见到村里来了这么多人。现在只要支部有需要，我们都会过来帮年轻人做点事。”老党员郑伏清说。

然而3年前，南岸村全乡绩效考核倒数，村党支部软弱涣散。2020年10月，坂中畲族乡党委实行“一名处级干部挂钩、一名乡镇领导班子成员包村、加配一名党建指导员和一个县以上机关单位结对”的“四个一”帮扶措施，在选派得力干部下沉主持工作的同时，及时调整不能胜任的干部人选。经多方动员，将在外经商的蔡锦锋邀回村里主持工作。

上任伊始，蔡锦锋就遇到棘手问题。“村里有3家红砖厂，污染河水，村民意见大。”来自宁德市农业农村局的驻村干部何陈铃回忆说。村两委挨家挨户走访村民，征集意见建议后，动员拆除3家红砖厂，并发动参与入股的党员率先拆除。

村两委获得村民的信任后，村里随即决定通过土地流转发展“稻鱼共生”绿色种养。“我们采取‘村委会+农业公司+基地+农户’的方式，复垦撂荒地，建成300多亩稻鱼蟹共生养殖区，水旱轮作发展稻鱼和食用菌赤松茸，产业初具规模。”蔡锦锋信心满满。

去年，村里筹资60多万元，配套建设了500平方米晒谷坪、600多米田间栈道和300多米防洪渠，房屋立面和村容村貌也得到整治，村里还引进露营休闲项目带动旅游产业发展。2022年，南岸村获评福建省美丽休闲乡村、宁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南岸村的转变，‘干部带头，组织引领’起到了关键作用。”坂中畲族乡党委书记林鸿波说。

为建强村级基层党组织，福安市持续深化党建工作联系点制度，推动356名党组织书记和班子成员共挂钩383个基层党组织及128个民族村，帮助63个村党组织摘掉了“软弱涣散党组织”的帽子。“我们将继续选派优秀干部、人才下沉基层，到问题多、困难多、矛盾多的地方去，知民情、解民忧、办实事、促发展。”福安市委书记周祥祺说。

江苏常熟创新企业党建

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

本报记者 王伟健

“通过‘抱团发展’，走品牌路线，企业的发展空间更广阔了。”家居服品牌“橙线”负责人刘晓阳说。刘晓阳口中的“抱团发展”，是江苏常熟服装企业聚力推新的举措，也是常熟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带来的变化。

纺织服装业是常熟市的重要支柱产业和富民产业，交易规模超千亿元。为了更好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今年以来，常熟市开展产业链党建“聚力赋能”行动，探索产业链高质量、高效益发展新路径。把党组织建在服装产业链中，覆盖重点企业200余家；开展走访调研，了解企业需求，问题即时解决率超七成；品牌服装产业链党委牵头举办学习交流、技能培训等产业链党建活动，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信息联通、产能对接、资源共享，实现各类生产要素在产业链上高效流转……

与此同时，常熟聚焦产业链发展痛点难点，围绕党群、政务、人才、科技、金融、市场6个方面，为企业“问诊开方”。通过组织搭台、支部示范、党员攻坚，推动企业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35%、产品制造周期缩短19%、产品合格率提升17%。“在品牌服装产业链党委的引领下，链上企业抱团成长、主动创新，向着品牌化、数字化、高端化的方向稳步迈进，实现了高质量发展。”常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潘浩说。

青海推进市、县、乡三级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建设

充实基层力量 形成调解合力

本报记者 乔栋

基层治理新实践

沿着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城北边龙王山山下的两排金黄杨树直行，便到了该县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互助县是务工人员大县，该中心接待群众反映的矛盾纠纷中，有七成涉及劳务纠纷。今年成立以来，该中心已受理调处矛盾纠纷374件，帮助群众挽回经济损失约1650万元。

这是青海省建设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的缩影。今年5月以来，青海省整合基层综治中心、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信访接待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诉讼服务中心等矛盾化解调处资源，推进市、县、乡三级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建设。

“五大中心”合而为一，并非简单的叠加。青海印发了《关于建立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的指导意见（试行）》，各地从统筹大数据、理顺工作机制、加强人员培训等方面，保障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的运行效果。

整合各方资源 强化部门联动

刚进互助县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的门，记者碰到了几名藏族务工人员，他们正激动地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献上哈达。

互助县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宗宾回忆：“前段时间，见他们在服务中心门口徘徊，他们汉语并不流畅，支支吾吾地比划着。”一番询问后，李宗宾才明白，原来这几人在附近干渠上干活，工作了一个月，包工头以各种理由推诿，不肯给付38878元的工资。来此之前，他们去过人社局，但因为没有合同，又交代不清雇主信息，事情迟迟无法解决。

信访的接待窗口，已挂牌到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李宗宾为他们倒了热水，暗自琢磨：“他们在附近的干渠上拉水管，是不是

和水利有关？”该服务中心随即联系水利部门、西山乡政府、县农业农村和科技局等相关单位的负责人来到服务中心，结合几名务工者的描述，通过项目总承包商，联系上了包工头。前后不到两个小时，事情得到顺利解决。

截至目前，青海已设立8个市州级、45个县级、402个乡镇级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实现三级建设全覆盖。“如果说以前是‘各自为战’，现在则是‘握指成拳’。”青海省委政法委基层社会治理处处长孙勇说。

张虎兵等30多户居民对此深有体会。他们居住在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59号旧9栋，因为一楼商户与房东发生纠纷，管道无法正常施工，导致楼上30多户无法正常用水达3个多月。最近，派驻到城西區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的高级法官杨仿浩等人反复研判，进行诉前调解，成功让房东“松了口”，优先解决了30多户群众的用水问题。

“以前的矛盾调解中心没有法院工作人员进驻，涉法涉诉的矛盾纠纷很难处理。现在，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在矛盾调解中心的基础上，新增基层综治中心、诉讼服务中心，而在城西區，更增添了检察服务中心和劳动纠纷调解中心。”城西區司法局局长张广花说，“这样大大充实了基层的矛盾调解力量，帮助群众实现小矛盾不出村（社区），基本矛盾就地化解。”

优化工作流程 高效化解矛盾

日前，记者来到城西區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进入大厅，左手5个服务窗口上方清晰显示“法律服务”“涉法涉诉”“信访窗口”等标识，右手则是一个数字大屏，上面有若干分区，有本年度矛盾案件数量统计，矛盾类型统计，各街道矛盾案件统计，以及手机端“矛盾纠纷随手报”的实时统计。往里走，还有视频联席调解室、心理咨询室等。

65岁的张安兵从司法局退休，最近又被返聘回城西區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担任负责人。他向记者介绍，为了更及时处理矛盾，“我们上线了‘矛盾纠纷随手报’的小程序，群众手机扫码上报的矛盾纠纷，平台就近指派街道、社区调解员赶往现场处置。如果碰到复杂情况，社区无法处理，在反馈情况后，由县区级服务中心专门分析研判处置。”

说话工夫，大屏中间的地图上，位于古城台街道的调解员头像红灯亮起。“矛盾纠纷随手报”后台很快显示出反映人的联系方式以及“暖气不热，物业不作为”的大概事项。约20分钟，该街道的调解员已赶到现场，提示灯由红转绿。“随后，调解员会反馈现场调解情况，如果调解不畅，则进入上报、研判和联席调解的流程。”张安兵说。

像这样的矛盾化解工作流程，城西區已“踩出”一条相对成熟的路子。“不管群众反映的是涉访涉诉，还是邻里纠纷，都会在综合接待窗口进行‘分流’，然后根据群众具体诉求，引导到合适窗口。”张安兵介绍。

除了“前端”分流，在“内部循环”环节，青海各地多有探索。对群众反映的矛盾问题进行研判，如果是涉及多个部门的复杂矛盾，则启动“吹哨报到”机制。青海各地明确成立社会治理综合服务联席机制，组长由党委政法委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法院、公安、司法、信访主要负责同志为副组长，成员为所有涉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劳动仲裁的单位，工作人员采取“常驻”“轮驻”“随叫随到”方式，确保多部门形成合力。

互助县调解员吉富家感触颇深。他去年参与了一起邻里纠纷调解，“本来是物业费问题的小摩擦，由于基层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无法调动公、检、法和住建部门资源，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成立后，公、检、法主要负责同志都兼任社会治理综合服务

中心副主任。“机制理顺了，矛盾纠纷化解效率更高了。”吉富家说。

统一信息平台 助力基层调解

走进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386平方米的办事大厅宽敞明亮，设有综合受理、信访接待、诉讼服务、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等8个服务窗口，同时还有远程视频室、共享调解室等多个功能室。截至目前，该市调解矛盾纠纷276件，提供诉讼服务412件，开展法律援助159件，法律咨询378件。得益于基层调解力量的充实，群众的矛盾诉求能更好、更快地得到解决。

记者走访发现，目前更多群众矛盾调处集中在县级层面，“这是因为群众对乡镇、街道的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比较陌生，习惯‘往上走’。对此，我们将进一步夯实‘三级联动’的底子，加大宣传力度、充实基层调解力量。”西宁市城西區委书记张俊录说。

大数据在基层矛盾调处中的应用将进一步延伸。“下一步，我们将探索建立全省统一的信息平台，打通各个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以综治和调解智慧平台为抓手，建立青海省矛盾纠纷调处的专门数据库。”孙勇介绍，统一信息平台建成后，“群众进门只需要刷身份证，问题矛盾的调处结果和进程就会像‘电子病历’一样呈现，脉络清晰、节点清楚，有利于上级服务中心工作更加高效地开展。此外，也可以有效防止重复上访、‘一案多投’的情况出现。”

“通过推进‘五大中心’资源整合，三级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的建设，推动解决一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纠纷和急难愁盼问题，让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青海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尚成财说。目前，青海省赴省级信访量从2022年的占比40%下降到目前的10.9%，首次发生结构性变化。



鄱阳湖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也是重要的越冬候鸟栖息地。为保护湿地资源和越冬候鸟安全，江西省永修县探索“林长+湿地候鸟保护”机制，县林业局会同公安、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以县林长办护鸟队为主要力量，通过水面巡逻、无人机监控等多种方式，对候鸟栖息地、迁徙等重要区域进行全天候巡护检查和动态监测。

上图：永修县林长办护鸟队队员在鄱阳湖上巡护。

徐娅萍 汪顺英摄影报道（人民视觉）

右图：永修县鄱阳湖湿地景色。

程应明摄（人民视觉）



四川通江县

强化执纪力度 回应群众诉求

本报成都11月22日电（记者王永斌）“付货，粮食直补款的问题，村里回复我啦，钱也到账了。”近日，在四川省通江县杨柏镇石坎村，廉情信息网格员王付贤接到了村民寇军的电话。

早前，王付贤在寇军家收集廉情信息时，了解到其未收到今年的粮食直补款。结合村里推行的“即收即办 即办即复”工作机制，王付贤将情况上报，经镇村两级核实，由于工作人员统计时弄错了寇军的银行卡号，导致粮食直补款发放不成功。镇纪委随即对村文书进行提醒谈话，责令整改。

今年以来，通江县纪委监委依托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强化执纪力度，结合公开“一张榜”、“码”上举报等方式，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针对收集到的各类事项和线索，通江县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快移快办、统一督办。县纪委监委通过来信来访台账化管理，限期加强跟踪督办。同时，对解决不力、成效不明显的单位公开曝光；对反映的典型、普遍性问题推动开展专项治理，确保干部作风持续向好。

通江县纪委监委还畅通多种渠道保证及时回复。检举控告类按程序进行谈话回复；民生诉求类则以网格为主阵地，公示栏、村村响、坝坝会等作补充，对群众诉求办理情况进行集中、动态公示。截至目前，该县收集惠民惠农政策落实、基础设施、集体经济等方面问题8834件，已化解4878件，曝光解决不力单位58个。

全国海关持续加强口岸食品安全监管

本报长沙11月22日电（记者申智林）11月22日，以“崇信尽责，共护国门食品安全”为主题的2023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海关总署主题日系列活动在湖南长沙举行。

近年来，海关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程控制、国际共治”的原则，扎实推进进口食品“国门守护”行动，不断完善进出口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体系，持续加强口岸食品安全监管。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海关累计发布进境农食产品不合格通报4222份，对2473批次不合格农食产品实施退运或销毁；对全国口岸7274家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卫生监督25799次，发现并依法处理不合格5311次；查处检验检疫行政处罚案件211起，案值4亿元，立案侦办食品走私走私犯罪案件580件，案值124亿元，坚决阻断不合格食品流入途径，严把国门食品安全关。

2023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开展以来，全国海关组织举办专题展览、专家讲座，印发科普读物，开展互动交流等活动，全方位展示海关在维护进出口食品安全方面的举措和成效，深入普及进出口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知识，营造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良好氛围。

Advertisement for Xiangxi Review (新湘评论), a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Hu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includes contact information, subscription rates, and a QR code.